

“真宗教家必爱国”^{*}

——论抗战时期的马相伯

薛玉琴

内容提要 马相伯是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宗教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民族危机急剧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诠释博爱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号召国人为捍卫人类的正义与人道,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马相伯认为,民族救亡运动,一要在政治上借鉴美国的民治主义,实行民治救国,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二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群策群力、共赴国难。马相伯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体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在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 20 世纪中国宗教运动的一个光辉典范。

关键词 马相伯 基督信仰 爱国主义 抗日战争

马相伯(1840—1939)是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宗教家。他生于民族忧患之际,死于国难当头之时。从他的思想变迁与社会活动看,马相伯一生主要经历了求学及教会生活,脱离耶稣会,投身洋务活动,以及重返教会,奔走于教俗之间等时期。

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他的原籍江苏丹阳马家村,早在明末利玛窦进入内地传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有名的聚族而居的天主教村落。因为世代信奉天主教,马相伯出生一个月后即受了洗礼,教名若瑟(Joseph)。1851年,马相伯进入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接受十余年的中学与西学文化课程的训练。1862年,马相伯进入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神学院(Seminary),在经过神学院特有的“精神训练”和按规定发愿成为一名修士之后,进入大修院学习神学、哲学等课程。^①1870年,马相伯以“特优”成绩通过耶稣会的考试,成为中国第一批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正式祝圣为司铎的天主教徒。不久,马相伯开始以神父的身份在安徽宁国和江苏徐州等地传教,这期间,他接受了教会安排,担任徐汇公学校长。

由于马相伯在担任徐汇公学校长期间,因强调中国文化课程的学习,并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而遭到教会方面的怀疑,被迫调离此校。至此,马相伯在教会长期遭受冷落、排挤,以及中外教士的种种不平等对待,终于促使他下决心离开耶稣会。1876年,马相伯通过长兄马建勋(时任淮军粮台)的关系,投身清政府举办的洋务事业。在长达 20 余年的洋务生涯中,他充当过幕僚、随员、顾问等多种角色。1881年,马相伯应邀随驻日本国大臣黎庶昌出使日本,任驻神户领事。1882年底,马相伯受李鸿章委派,担任朝鲜国王顾问,帮助朝鲜国整顿外交,推行新政。之后,他又受李鸿章指派,赴美办理商业事务。1897年,马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马相伯与近代中国”(项目编号:2005038630)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285页。

相伯在经受甲午海战失败的打击,妻子海难丧生,母亲临终对其脱离教会行为的指责等一连串国破家亡之痛后,经过痛苦的思考,在昔日同窗好友沈则恭神父的斡旋下,获得了罗马教廷的赦免,重返教会。

之后,马相伯长期定居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开始过一种半隐半俗的生活。^①在教会内部,马相伯一方面虔敬于信仰,积极从事教会的文化建设工作,并针对辛亥革命后“风俗浇漓,纪纲废弛”、世道人心愈加败坏的社会现实,提倡以《圣经》之训诫教化人群,积极呼吁通过基督信仰来救治人心,增强国民道德。凡有干涉信教自由,必集全力反对,如民初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另一方面,马相伯对具有专制性与殖民性的教会又多有不满。民国初年,他针对教会的种种弊端,联合英敛之等人与法国耶稣会公开斗争,承担起领导中国天主教自主化运动责任。他竭力提倡培养本国的教会人才,1912年9月20日,马相伯与英敛之等人越过由法国人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联名直接上书罗马教皇碧岳十世(Saint Pius X),吁请教廷在北京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25年凝聚其心血的辅仁大学在北京创立。他又坚持谋求教会管理自主权,主张西方来华传教士改为中国籍。经过马相伯等人多次上书倡议与不懈努力,罗马教廷同意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设立“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其中1926年有6位中国籍教士被罗马教皇祝圣为主教。马相伯还提倡在教会内部,用中国语言传教,以此反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③在教外,即在世俗政治社会中,马相伯对内积极谋求中国的内政改革;对外争取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898年,他上书清廷请设译学馆于上海,襄办维新事业;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以培植人才;1907年,应梁启超之邀出任政闻社总务员,谋求立宪;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代理江苏都督;民国初年,他又北上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为制定宪法积极建言;20世纪20年代呼吁废督裁军,主张地方自治。对外方面,从清末积极倡议与领导抵制美货运动、收回沪杭甬路权运动到民初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马相伯始终以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积极活跃于社会政治舞台。

蒋梦麟在《西潮》中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④这句话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不同境遇与方式。与佛教传入中国不同,基督教是在英国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后才加快传播步伐的,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所以,在1949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直被近代中国人视为“洋教”。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使包括马相伯在内的中国基督徒们在宗教信仰和爱国情怀之间经常处于紧张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天主教徒,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马相伯脱离耶稣会期间,为保持自己的信仰,他曾写信要求文成章(Louis Chauvin)神父允许他领受圣体,并由其母陪同到董家渡请求宽恕。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马相伯一生的思想、学术与行事皆本“国家民族至上”。^⑤在宗教信仰,特别是教会利益与民族感情发生冲突之时,他首先捍卫的往往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19世纪70年代,他愤然脱离耶稣会,投身洋务运动;即使在重返教会后,他为了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仍然与耶稣会展开斗争;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领导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多次上书罗马教皇,强烈要求中国天主教摆脱列强政府和法国“保教权”的干预,反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如他的弟子方豪神父所说:“可见先生之中心思想,实为爱国,无一事,无一语,不与爱国有关。先生当外力侵入之世,所受刺激特深,故当慨乎言之!”^⑥这种价值取向在民族危机急剧上升的历史时期愈益突出。抗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0页。

② 孙邦华:《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黄书光:《马相伯宗教价值观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学术界》2004年第1期。

④ 蒋梦麟著《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页。

⑤ 《敬悼马相伯先生》,《中央日报》1939年11月6日。

⑥ 方豪:《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七),《民主评论》(台湾)第6卷第15期。

战时期,马相伯努力调适天主教徒与国民的双重身份,协调基督教中的博爱与公义的教义,积极主张武力抵抗侵略,号召国人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则更加完美地诠释了他的宗教精神与爱国情怀。

一 在爱与公义之间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了东三省。之后,日本军队又侵略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国难当头,抵抗外侮,保卫中华民族应是每一个中国国民应尽的义务。但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特殊的群体基督徒来说却面临着民族主义的严峻考验。一方面,作为国民一分子,在中华民族遭受厄运之时,他们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的忠诚”,另一方面,其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宣扬的和平博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冰炭不相容的”。^①结果造成了教徒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认识矛盾,这种矛盾在基督教新教中尤其突出与明显(在20至30年代基督教新教会流行从欧美教会中传来的“唯爱主义”思想)。1938年,《真光》杂志曾这样描述当时中国基督徒的情形:“主张抗战的固然不少,但是主张积极用爱来感化敌人,作为进攻利器的也不乏人。”^②有人进一步考察认为,面对国难,基督徒的立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主张坚决抵抗,“献身疆场,以赴国难者”;一类是所谓忠诚稳健派,他们似乎“不能断定基督徒应否加入抗敌、赴国难的工作”,处于进退维谷之间;还有一类以朋友会和惟爱社为代表,主张“惟爱主义”,他们“站在耶稣惟爱主义的立场,反抗战争之爆发,不赞成抗敌的行为。虽不批评他人抗敌行为,至少他们自身,要保持信仰的一致,人格的统一,决不参加任何抗日的事工”。^③

当基督教新教界还在为“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讨论之时,马相伯即愤然指出:“问题不在于战与不战,而在于如何战?而在于如何获得实效。”^④毫无疑问,马相伯属于武力抵抗派。当然,他作为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一位天主教徒知识分子,必须为他的立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做出合理的阐释,特别是要阐释武力抵抗态度与基督教“博爱”教义的关系。

作为武力抵抗派,马相伯从来没有否认“博爱”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价值和最高理想的意义,但同时也高度重视基督教社会思想中的公义主题。爱与公义,和平与战争本来就是圣经中两对相互并列的、互有张力的主题。圣经不仅说“天主是爱”,而且也关注正义、关注公义。圣经《旧约》就记载了神派遣其子民争战,改变不公正局面的事迹。圣经《新约》也允许为实现正义而使用武力。耶稣虽讲博爱与和平,但必要时他也绝不反对使用武力。据《若望福音》记载,为了洁净圣殿,耶稣拿绳子作鞭子,把牛羊赶出去,并且还推翻了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若望福音》还记载,耶稣被捕后,差役用手掌打他,当时他并没有把另一个脸也转过去让差役打,而是大声责问差役:“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为什么要打我呢?”^⑤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上,许多基督徒坚持反对暴力的立场,拒绝参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行动。但4世纪初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前后,教会在这方面开始改变态度,奥古斯丁提出了“正义战争”(Just war)论。^⑥这种理论在中世纪的欧洲经过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发展

① 陈晋贤:《基督徒对于国难态度的分析》,载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481页。

② 《国难期间基督徒急于求解的两个问题》,《真光》第37卷第10号(1938年10月),第1页。

③ 刘子静:《基督徒与国难》,《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5期(1933年3月),第33页。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5页。

⑤ 转引自王美秀:《基督宗教的战争和平论》,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1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⑥ 转引自姚西伊:《唯爱主义与民族主义——吴雷川与徐宝谦社会伦理思想之比较》,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页。

而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到 13 世纪,基督宗教战争伦理的主要内容已经确立。所谓正义战争理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宣战应遵守的准则,拉丁文为 *ius ad bellum*,表示宣战的权利;二是战时应遵守的准则,拉丁文为 *ius in bello*,表示开战时应采取的正确行动。进行正义战争的基本标准有以下几点:第一,战争必须由国家当局宣布;第二,必须有正当理由;第三,必须有正当动机;第四,必须是最后手段;第五,在战争中必须使用正当手段;第六,必须有合理的取胜希望;第七,通过战争获得的善必须大于战争的恶。^① 正义战争理论还主张,必须严禁杀害无辜者和非战斗人员,严禁直接杀害平民。

为捍卫公义,马相伯在揭露中日战争的实质与谴责日军的暴行时,特别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与非人道性。马相伯说:“日之来犯,不宣而战,按国际公法言,不正当!且其残暴,戮我民众,按人类正义言,实野蛮,乃至炸毁我文化建筑、生产工厂,甚至侮辱妇女加以戕害,捕童子军亦施毒手;种种越出文明正轨之行为!总之,不仅欲亡我国,实则将灭我种!”^②他认为,现今日本既然不义,发动侵略战争,那么中国为维护人类正义除了奋起抵抗别无出路,这是符合基督宗教的正义战争理论的。因为,要和平必须维持公义;维持公义才有真正的和平。所以基督教一方面主张和平,一方面也要维持公义。不过,维持公义的力量,不只是靠法理,也须靠法理背后的武力。这就为基督徒武力抵抗者提供了合理的进路。

另外,马相伯认为日本的暴行,是人类罪恶的表现,为了维护人道主义也必须持武力抵抗的态度。他在应邀为广播电台作抗战动员时自述:“我九三老人是宗教家,向来不主张复仇的!那么,为什么坚决底提倡为人道主义而奋斗?”马相伯引用孟子的主张说,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现在日本这个“国际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或用火器,或用毒气”,杀害我无数的同胞,“真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我们能不抗争吗?不然,人道安在?可证我所主张,根本并非复仇”!^③他强调,这在《圣经》上是有根据的。“救世主亲谕曰:‘我有新命,勅付尔等,俾尔等彼此互相友爱,宛如我之亲爱尔等,而尔等亦彼此互相友爱也’。”^④这才是真实的人道主义!所以,马相伯号召说:“现在我们爱人,要效法救世主爱了我们;流尽圣血,救援人类!”而日本侵略者违反此道,即可采取必要的手段予以还击。“因此,我们照人道主义行事:所谓攻其恶,并非来复仇!那用火器毒气等违反人道的暴行,我们不仅要来抗御,实际上要来制裁它才算是尽了人道!”^⑤

再者,马相伯十分看重所谓基督徒的双重身份的理论,强调基督教的教义是教人爱国的。他认为,天国选民与本国国民的身份并不冲突,二者之间,他首先是一个国民,其次才是教徒。作为中国的国民,基督徒同样需要为国家服务尽义务,包括扛枪打仗。因为“基督教仍然承认现在国家行政的权力,是上帝所给予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中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⑥基督徒既要服从掌权的,当然要参与一定强制和暴力行动。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国民身份与义务是具有神圣性的。因此,马相伯在《国难言论集》中一再强调:“余虽年迈,一国民也”^⑦;“余老矣,然对于国民一份子之天责未尝或忘”^⑧;“余得天赋之信心,爱国

① 转引自王美秀:《基督宗教的战争和平论》,赵建敏主编:《天主教研究论辑》第 1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 页。

②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41 页。

③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5 页。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2 页。

⑤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76 页。

⑥ 姚西伊:《“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载刘家峰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⑦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42 页。

⑧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4 页。

实其天责”。^① 马相伯指出,他的这一立场也本乎基督的教义:“余年逾九十,不幸遭国难……余于世无求,口舌慇懃果为何事?惟有钦崇造物主,救世主,天地君王,万国皆其国也,尚一再痛哭日路撒棱将为邱墟,疼恤本乡本土,真不能讲得更哀怜更动情。览斯文者,请喻此旨。”^② 耶稣基督虽然是万王之王,但对于自己乡土犹太首都耶路撒冷之将被摧毁,仍一再痛哭,由此可见教主耶稣即是爱国的典范。另外,马相伯又特别指出天条十诫中第四诫孝敬父母所包含的义蕴,“引圣多玛言:孝爱一对于造物主万有真原;二对于生身父母;三对于父母之邦!故新多玛学派领袖枢机墨尔西氏之名句,称‘真宗教家必爱国’”。^③ 马相伯又以中外历史上宗教家的爱国事迹论证说:“我明末清初时代之瞿式耜,法国之女英雄 Sainte Jeanne D Arc……朝鲜志士安重根等;皆罗马加特力教(即天主教)中之忠实信徒,而尽忠报国者也!”^④

总之,在马相伯看来,爱国与爱教是同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以爱国为应尽的义务,已成为当时中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上层人士的共识。著名的天主教人士陆徵祥、南京教区主教于斌、雷鸣远都是典型的代表,在抗战期间他们的爱国言行历历可表。陆徵祥一直奉马相伯为师,在马相伯的影响下,他始终坚持认为,基督徒必须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说:“基督的宗教把爱国著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是纯粹的爱国志士。”^⑤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追随马相伯,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之中。“当相伯发表国难言论集,兴老(陆徵祥——笔者注)发表满洲问题评判,而相伯以九十衰翁进德修业,赤心爱国,实在配作全国人的模范。兴老就代表国人景仰的心理,奉相伯为师”。^⑥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即使在争议较多的基督教新教界,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原先那些摇摆于“唯爱”与“公义”之间的中间调和派也趋同于武力抵抗派。应该说,马相伯的武力抵抗态度代表了当时宗教界的主流方向。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淡化唯爱主义和国际主义,靠拢民族主义,投身全民抗日的大潮之中,乃是三十年代中国基督徒群体内的一个明显趋势。”^⑦

二 为正义与人道而战

马相伯不仅从舆论方面宣传、发动教内外同胞投身抗日活动,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声援抗日军民的斗争。冯玉祥在纪念马相伯一文中曾说:“自从‘九一八’以后,先生时时刻刻都不忘记收复失地。我在察哈尔发动民众抗日同盟军时,先生曾给与极大的精神鼓励。先生不仅对察省抗日一事如此;对于‘一二八’、长城诸役,先生都非常关心,都尽过最大的力量去帮助抗日军民。”^⑧ 冯玉祥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马相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援助抗日军民的重要事迹。

(一) 劝募中华义勇捐,捐助东北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为收复东北失地,东北义勇军在马占山、李杜等将领的领导下,转战于黑山白水之间,坚持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马相伯对东北义勇军抗日行动深表敬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十九路军在上海御日是为国家争人格而战,那么,东北义勇军则是为世界卫人道而战。所以,他呼吁全国同胞,“要团结一致,援助义勇军,收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32页。

② 张若谷编著《马相伯先生年谱》文海出版社影印 1971年版,第 258页。

③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068页。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069页。

⑤ 罗光著《陆徵祥传》香港真理学会 1949年版,第 189页。

⑥ 罗光著《陆徵祥传》香港真理学会 1949年版,第 202页。

⑦ 姚西伊:《唯爱主义与民族主义——吴雷川与徐宝谦社会伦理思想之比较》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58页。

⑧ 冯玉祥:《纪念国之大老马相伯先生》,《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606页。

复那东北失地,免除全世界大战”!^①

如何进行援助?马相伯倡议,发起“天天不忘救国,人人援助东北”的日捐运动。日捐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义务捐,每人一日捐一铜元;第二种是国难特别捐,为节省奢华设立,以补义务捐之不足,如拒毒捐、奢侈捐等。马相伯指出,国民义务捐,方法简便易行,“虽乞丐亦能捐”,它比其他无定数无定期的捐款略胜一筹;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唤醒同胞,日日警惕,一铜元,一份子”,个个负责,天天不忘救国。^②国难特别捐,其意义不仅使国民负起救国的责任,支援抗日行动,而且就此可以让国民戒掉恶习,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改良社会风气。

为使倡议能够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马相伯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短短3个月时间内,以90多岁高龄之躯先后作了12次广播演说,以唤起全国人民“自救”。^③对马相伯此举,上海的《申报》《大美晚报》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1932年12月27日《申报》就作了题为《援助东北义勇军,马相伯播音演讲》的报道。报道称:“九三老人马相伯热心爱国,老而愈烈,自去岁九一八以来,大声疾呼,唤起同胞爱国思想,凡聆其言论者,莫不震动感奋……”^④

(二)发起组织“不忍人会”,支持长城抗战。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吞并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又向热河,山海关发起进攻。马相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一边发表《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奉告国人必须纠正当下存在的武人富贵自保、文人苟且偷生、国人过于悲观或乐观之心理弱点,号召全国同胞“各尽天职,踊跃输将,竭心力,贡财力,拥护卫国英雄以抵抗到底”^⑤,一边效法耶稣基督因不忍人的堕落,不忍人的死亡,不忍人的受罪,自愿降生为人,流尽圣血,救赎人类的精神,于1932年11月11日,发起成立“不忍人会”。

“不忍人会”发起以后,得到全国各方人士的热烈响应,捐款捐衣者络绎不绝,甚至还有亲赴前线者。雷鸣远司铎即是其中一个典范。比利时人雷鸣远是马相伯多年的老教友,为平、津《益世报》的创办人,儿时便酷爱中国,1927年呈准加入中国籍。^⑥自马相伯创立“不忍人会”后,雷鸣远积极响应,组织了安国县不忍人分会。1933年春,长城战起,他组织前方救护队,亲率二百余义士,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喜峰口最前线,救护前线受伤官兵。以后,绥远战起,他又率“敢死队”在傅作义将军的玫瑰营效力了三个月。

马相伯对老友雷鸣远神父的义举感慨系之,撰文称誉他的举动,“当胜于伦敦所倡和平军之纸上空谈”,“将来与喜峰口抗日英雄,永留深刻印象,在救国人士心理中!”同时,对雷鸣远所组织的救护队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可以说,雷鸣远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不忍人会”的仁爱之心,同时亦实践了公教大公无私的博爱精神。马相伯热切地希望全国青年同胞效法雷鸣远的义举,到前线去。雷鸣远的义举又强烈地感染着社会上每一个爱国之士。“不忍人会”因此不仅获得一些社会名流诸如徐谦、章太炎、沈恩孚等人广泛赞许及支持,而且也得到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将军以及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热情赞扬。冯玉祥因此致函马相伯,称颂“长者发起‘不忍人会’,以为天下倡,定能振聋发聩,使懦夫立,怯者勇,恢复民族精神,与日寇为持久之斗争”。同时高度评价雷鸣远:“以外人而热心仗义如此,至为感佩!近日前方紧张,救护工作,实为要事。”^⑦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3页。

②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3页。

③ 方豪:《四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参加抗战工作之一斑》,《东方杂志》复刊第11卷第1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④ 《援助东北义勇军,马相伯播音演讲》,《申报》1932年12月27日。

⑤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2页。

⑥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7页。

⑦ 《冯玉祥函九四老人,赞成不忍人会》,《申报》1933年3月29日。

(三)鼓励与慰勉冯玉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回忆,马相伯与冯玉祥因为国难初识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上海,以后又为了抗日救国的共同使命把他们两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3年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挺身而出投身抗日运动,其中就有马相伯的鼓励与督促之功。1932年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马相伯以行草书写陶行知发表在《申报》上的两首讽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打油诗,并装裱成立轴一幅赠送冯玉祥,他在题跋中即对冯玉祥“责以大义,勉以抗日”。^①1933年3月初,马相伯为“热河沦陷,平津告急”发表对时局的谈话,再次督促冯玉祥,警惕日寇进犯察哈尔。^②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终于在社会各界翘首以盼中正式举起抗日大旗,在张家口向全国发表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马相伯接此消息,备感欣慰,立即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冯玉祥,对其慰勉有加。^③两天之后,马相伯又与章太炎致电勉励冯玉祥,表示愿以老迈之躯与全国人民一道充其坚强后盾,电文道:“执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心;执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国有血气者之言;执事之行,必能彻底领导全国有血气者之行。某等虽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随全国民众为执事后盾,惟秉义直前,毋稍瞻顾。”^④在国民党政府对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与污蔑的情况下,马相伯、章太炎的贺电确实给处在精神困顿中的冯玉祥以极大的激励与慰藉。冯玉祥素所尊重的国民党中央李烈钧在贺电即说:“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之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国学泰斗,既代国人勗贺矣。”^⑤由此反映了马相伯贺电及鼓励的重要作用。

当收复失地的战斗打响后,马相伯不仅时刻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与章太炎联名致祝捷电于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与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以鼓舞士气^⑥,而且对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阻挠、破坏抗日同盟军的行为给予猛烈的抨击与揭露。抗日同盟军北征胜利之后,冯玉祥在全国抗日民众的热情支持与鼓励之下,决心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于7月27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并发出成立通电。蒋介石闻知此事,极为恼火,认为搅乱了他的“剿匪”计划。

其实,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⑦汪精卫则随声附和,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⑧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则集结优势兵力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武力围剿。为了断绝同盟军的经济后援,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同时,蒋军又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在日蒋进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7月12日多伦克复当天,冯玉祥致电马相伯、朱庆澜,一面告知多伦克复的实际战况及国民党相逼甚紧的情况,一面请求马相伯等孚于社会声望的爱国人士伸张正义并给予指导。^⑨

马相伯接电后,针对汪精卫不顾起码事实,极尽诬蔑之能事,致电诘难,给予揭露。^⑩在马相伯

① 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编《江苏掌故》,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② 《九四老人马相伯发表对时局重要谈话》,《申报》1933年3月10日。

③ 《马良章炳麟贺电》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8、79页。

④ 《马相伯章太炎电勉冯玉祥》,《申报》1933年6月2日。

⑤ 《李烈钧贺电》,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⑥ 《马良章炳麟祝捷电》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4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⑧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⑨ 《冯玉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⑩ 《马良汪兆铭电》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3、24页。

等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逼迫之下,蒋、汪未敢对同盟军立即言战,但仍坚持既定的压制政策,对冯玉祥继续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冯玉祥在蒋汪政府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告,“对察省抗日军事作和平结束”,并发电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对此,马相伯与章太炎等既深表遗憾,又对冯玉祥加以劝慰:“执事以枪口不向内之誓言,俯听关处,明轩继任,付托得人,存大信也,失军得信,执事亦无不利。时局正艰,国亡无日,一身虽退,尚非骑驴种菜之时,所愿老骥壮心,勿灰于伏枥也。”^①同时,马相伯与章太炎又联名致电宋哲元,称赞其“喜峰一捷,功冠诸军”,勉励宋哲元能继冯玉祥之后,“萧规曹随”,守住察哈尔省,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②马相伯还饱含激情为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题字:“浩气千秋。”

三 民治救国:从地方自治到乡自治

马相伯认为,在强敌入侵之时,欲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机,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而要实现全民族一致抗日,唯有国家政制改弦易辙,由“训政”转向“宪政”。“如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用纳之于轨道”,而想求得国家长久的和平安宁,那是缘木求鱼。要想使国家长久安宁,必须有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各种政治势力有平等的参政机会的机制,这就是民主宪政。

九一八事变之后,马相伯与胡适、王造时、罗隆基等人权派人物以及其他党派组织利用国民党召开国难会议之机发起了一场要求民主宪政的运动。运动首先从江苏省国难救济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等团体的组织开始。马相伯作为这两个团体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便理所当然当选为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理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在成立宣言中,对国民党政府现行的“党治”政制及内外政策予以猛烈的抨击,指出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于今五年”,“五年以来,吏治失修,内争不息,以训政而酿成专制”,国力日衰,致“铸成失地丧权之大错”^③,提出了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张。^④接着,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又以马相伯领衔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宪法会议,制定宪法,实行宪政。^⑤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成立,以及由马相伯领衔发表的一系列通电,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响应。上海、北平等省市纷纷成立相应的组织,支持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主张。诸如由原人权派成员王造时、青年党左舜生、陈启天等人在上海成立的“民治协会”;孙洪伊、章太炎、李烈钧成立的宪政促进会等等。这些团体都为实施宪政,挽救国难而积极展开活动。

与此同时,李烈钧与孙科等人联合在国民党内部展开了要求开放政权、纳政制于宪政民治之轨道的斗争。^⑥在全国一致要求实行民主宪政、共御外侮的强大压力下,1931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根据蔡元培的建议,决定邀请一批专家、名流,筹备召开一次“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等事宜,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1932年1月,马相伯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之一。4月1日,国难会议在“行都”洛阳召开。马相伯委托秘书徐景贤代表出席会议,并递交了《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附刍议)》提出了民治救国的主张。

马相伯的民治救国主张虽然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但主要受当时美国总统威

① 《冯玉祥通电结束军事,马相伯、章太炎联名电冯玉祥慰勉》,《申报》1933年8月9日。

② 《冯玉祥通电结束军事,马相伯、章太炎联名电冯玉祥慰勉》,《申报》1933年8月9日。

③ 《苏省耆老要电》,《申报》1931年12月4、5日。

④ 《国难救济会通电》,《申报》1931年12月23日。

⑤ 《国难会电请实行宪政致一中全会电》,《申报》1931年12月25日。

⑥ 周元高、孟彭兴、舒颖云编《李烈钧集》下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4页。

尔逊民治主义的启发。马相伯在提案中多次引用 1920年 7月 12日威尔逊致国会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林肯言：‘正义造成力量。’吾人既深信之，便当实力以赴之。余得天赋之信心，即民治主义是也。民治主义，今当受最后之试验，其主义之纯洁与精神之魄力，实大无穷！今将表曝于世人，人人奋斗之日至；其不奋斗者，当绝之于斯人也！”^①早在民国初年，威尔逊民治主义思想就对马相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 1917年 6月国会二度被解散，南北问题发生，各派军阀争霸，混战不断加剧，致使国是日非，生灵涂炭。当时，自袁世凯死后一度消沉的“联省自治”思潮再度泛起，而威尔逊的民治主义主张就是促使这股思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曾参与联省自治运动的沈钧儒在《联省民治谈》中有一段叙述：“自国会二次解散，南北问题发生，分治之势尤盛。美总统威尔逊倡导人民自治，国内益受影响，于是各省自治之声，纷然并起，不可遏抑。”^②在这股思潮中，马相伯是当然的推动者。但他对“联省自治”的理解与地方军阀和一般士绅阶层大不一样。按当时的说法，“联省自治者，不过分中央政府之权于地方政府，并非分政府之权于人民”。^③而马相伯所主张的“联省自治”，确切地说，是“联邦制”，更注重人民“自治”，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民治”主张，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威尔逊民治主张的本意。这从他写于 1918年的《国民照心镜》中可以看出。马相伯在该文诠释何谓民国时即指出，所谓民国，应以国民为主，人民在国家应居主人翁地位，人民不仅于“国土财用有物主权，物主权以外又有管理权，管理权之及于一国者，曰政治权”。^④通俗地说，就是国家不仅为民所有，国土财用为民所享，而且国家应由人民来管理，即民有、民享、民治。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民本学说中，历代大儒亦不乏对民有、民享观念的阐述，恰恰未走上民治的一步。^⑤有“民有”、“民享”的中国传统政治只能称之为民本政治，即开明的专制政治。而是否有“民治”是区别西方的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民本政治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一实质区分，马相伯在民国初年就已注意到，并敏锐地提出民国理应重民治，把民治最要之点归结为地方自治，希望通过地方自治培育民众的民主观念、锻炼他们的自治能力。因此，他在反思何谓民国之民时，就把自治、自立、自由作为国民的表征，其中尤其强调自治的作用。“惟自治而后能自立，惟自立而后能享用其七大自由权。否则为野心家之政客与政府，讫故摧残，而无可申诉”。^⑥为此，马相伯还创办地方自治讲习所，并亲自授课，以造就建设模范县之人才，推进以县为单位的方自治。^⑦

如果说民国初年马相伯把民治的落脚点置于地方自治之上，那么到抗战前期，急剧上升的民族危机则促使马相伯不得不对民治的途径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民治应从乡里组织起”，最终实行完全的县自治，就是他深入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果。马相伯这个时期主张的民治，就是“整个人民，乡邑归乡邑，州郡归州郡，家家户户，自出财力，自出心力，以自治也”。^⑧他建议，仿效美国华盛顿联邦建国的办法，同时结合中国古代的保甲法，“联二三郡为一州，每州以保甲法，由乡而县，县分东西南北四乡；乡分东西南北四区；区分十家为小甲，百家为中甲，千家为大甲，每大甲以登记法为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64页。

② 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72页。

③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6、37页。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1页。

⑤ 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页。

⑥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32页。

⑦ 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文汇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8页。

⑧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22页。

驱除不良份子及徵集胜兵者”。^①在这个以县为基本单位的民治组织中，人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②马相伯指出，以上民治方案要付诸实施，关键在于制定法律，“必须人民立法，而后人民共守”。因此，制定一部合乎民主精神与人权保障理念的宪法，实施宪政则成为30年代初包括马相伯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追求的目标。

美国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中指出：“民主即民治，是一种人民自治的制度”，“民主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它就是自治。”^③不难看出，马相伯所主张的民治，其实质就是要在建立民主制度，以法治国，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所主张的民治方案，既能抑制由中央集权而变为“中央集钱主义”，又可激发人民自觉保护财产权、管理权和政治权的意识。“使人民知道政治是自己的事，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养成爱护国土的观念”。^④事实上，马相伯的民治主张主要借鉴了美国联邦制的乡镇自治制度。不独在政治制度上借鉴美国的民主，马相伯还认为，实施民治救国还必须效仿美国的基督教信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到处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⑤），以激发人的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强调说，要实现民治，首先必须救正人心，救正之法，“仅以儒释道之法，未免太迂太晦；故莫如径用天条十诫”！他乐观地说：“苟能奉行天条十诫，则三月可化民成俗，而宣传可达五洲。”^⑥总之，马相伯的民治救国主张所体现的“以民为本”、主权在民的思想，对于当时集中一切民财、民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抗战不仅需要民主政治，更需要全民族空前团结，可以说民主与团结对于抗战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此，马相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致力于民主宪政的运动，主张民治救国，而且还积极活动，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谴责不抵抗主义，率先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连续发表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等文，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二百余万，年耗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国币，民国以来，兵连祸结，无日不演阅墙之惨剧，然而外侮骤临，即望远却，崇朝之间，东北半壁山河，尽沦敌手！对内徒言镇静，高唱不抵抗；对外亦徒乞灵于木偶之国联，陈诉呼吁，捉襟见肘，穷态毕见。”^⑦他认为：“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而他极力呼吁：“嗟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⑧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马相伯对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批判更加激烈。1936年7月12日发表在《救亡情报》上的《救国谈话》即典型地反映了马相伯的批判立场。他在文中抨击南京国民政府为“缩头乌龟”：“这样的政府，我没有旁的话可以形容，我们中国政府实在是‘帮凶’。”“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这是一定的结果。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⑨

①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23 页。

②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35 页。

③ [美]科恩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第 273 页。

④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43 页。

⑤ [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337 页。

⑥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23 页。

⑦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06 页。

⑧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902 页。

⑨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96、597 页。

(二)发起创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5年华北事变的爆发,促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救亡形势的变化迅速调整政策,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主张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将苏维埃革命路线转到民族革命路线。而同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则直接触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12月27日正式成立,马相伯、沈钧儒等35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1936年1月28日,为纪念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四周年,上海社会各界又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马相伯、沈钧儒等19人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为了大力宣传救国运动,扩大社会影响,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加紧了侵略步伐,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组织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马相伯等救国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造成强大抗日救国的社会舆论。在马相伯、宋庆龄等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马相伯、宋庆龄等40余人被选举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从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包括马相伯在内的救国会人士已经认识到,若不依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内的全国规模的全民族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他们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预见到建立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此,救国会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客观评价了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具体主张和建议。救国会的成立,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马相伯作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更是功勋卓著。他不仅是救国会的早期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最初的发起人,而且救国会成立以后之所以能够公开组织活动,并产生影响,就是因为拥有像马相伯这样有着崇高社会声望的领袖存在。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并非什么样的组织都可以公开活动,像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都没有公开出来。章乃器解释其原因时说:“公开出来的条件是要有可以公开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有社会地位就比较不怕扣帽子,不怕抓。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特务就可以随便抓,扣上一顶‘乱党’的帽子,还可以随便杀……有社会地位的人也要敢于站出来,因为,危险总是有的……可以暗杀嘛,杨杏佛便是例子。”^①后来的救国会的活动也大多是半公开的,而马相伯则是“第一名公开领袖”。虽然马相伯因为年老,直接负责救国会的具体事务并不多,但作为一名被公认的救国领袖,一切文件、通电均由马相伯领衔,可见马相伯的革命胆识。^②因为救国会的活动是半公开的,有时找个开会的地方也很不容易,马相伯的家自然成为极好的掩护堡垒。据马相伯自述,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会后,马相伯还亲自书赠出席会议的诸委员“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互相鼓励。^③

(三)主张并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马相伯应冯玉祥、于右任之邀,由上海移住南京。^④恰在此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如何救蒋问题上迅速分为两派:一派以何应钦、戴季陶等人为首,主张攻打西安,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

① 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② 周天度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3页。

③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8页。

④ 《马相伯昨入都应冯、于邀请在京久住 抵京时欢迎甚盛》《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

范,释放蒋介石;一派则以蒋的亲属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国民党上层中有识之士冯玉祥、李烈钧等为主,从蒋的安全考虑,更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主张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南京中执委与中政委紧急召开多次会议,商讨对策。两派斗争异常激烈。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6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又召开会议。会上,为是否攻打西安争执不下。会议一结束,冯玉祥立刻前往马相伯先生家,征求意见。^①马相伯当即致电张学良,晓以民族大义:“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如楚人之杀子玉也。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使东西洋各国,知中华民族相忍为国之道德,老夫为国说项,非为个人,想世兄定能谅解。”^②接着,马相伯又决定请蒋介石素所信任的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去北平转西安帮忙调停解决。马相伯虽然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但在内战可能威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他坚持以大局为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并力促和平解决事变。他的这种主张与举动是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群策群力、共赴国难”的“救国阵线”主张的坚守。同时,在他看来,要想抗战取得胜利,必须督促、拥戴国民政府抗日。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掌握着国家政权,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政府参加,才可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参加,单凭共产党或任何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况且,在马相伯看来,国民党自五大以来,蒋在抗日的问题上已迈出关键一步,并且也有一些实际行动,更何况绥远抗战正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尤须蒋介石的领导,确保蒋之安全。难怪于右任追念乃师时称:“‘九·一八事变’起,先生已93岁然忠愤郁律,意气激昂,仍居民众抗敌前锋,责备政府甚严。及余自京往谒,为述中央忍辱负重之苦衷,与国防准备之努力,则大喜。欲集会各阶层势力,巩固阵营,一致抗战,而于蒋委员长推服既至信托尤深。”^③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由此初步形成。

1939年11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马相伯与世长辞。早在4月社会各界为马相伯百岁华诞举行庆祝活动,《新华日报》即发表了短评,高度评价了马相伯在抗战期间的历史贡献:“近几年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先生不辞劳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④中共中央致电,尊称马相伯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综观马相伯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中共中央的评价可以说恰如其分。作为一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宗教家,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马相伯对民族救亡运动的理解要比一般政治家深远得多。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诠释博爱与公义的关系,号召国人为捍卫正义和人道而进行坚决的武力抵抗,驱逐侵略势力,又从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层面提出实施民治救国的策略方针,从而从根本上使中华民族摆脱一百年来来的殖民统治,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民主国家。总之,马相伯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及事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其基督信仰是他毕生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之活力源泉。

(作者薛玉琴,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0页。

② 《马相伯致张学良电》《大公报》1936年12月15日。

③ 宗有恒、夏林根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4页。

④ 宗有恒、夏林根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